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化敌为友 持久和平之道

〔美〕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著 宋伟 等译

注定要陷入无休止循环的冲突和战争之中吗？相互竞争的国家能否合作伙伴从而建立长久而稳固的和平呢？这本书为国家如何摆脱地治竞争以及从敌手变为朋友提供了大胆的创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化敌为友 持久和平之道

〔美〕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著 宋伟 等译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66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美)查尔斯·库普乾(Charlse A.Kupchan)
著;宋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7991-5

I.①化… II.①查… ②宋… III.①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 IV.①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3083号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by Charles A. Kupchan
Copyright © 201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普林斯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未经出版方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电子或机械方式复制或传播。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

HUA DI WEI YOU: CHIJIU HEPING ZHIDAO

著作责任者 (美)查尔斯·库普乾(Charlse A.Kupchan) 著

宋伟等译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99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5.25印张 371千字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顾问委员会

主 任 胡鞍钢

委 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胡鞍钢 G. John Ikenberry

袁援平 王缉思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门洪华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常志霄 陈玉刚 樊吉社 耿协峰

郭树勇 韩召颖 李熙玉 门洪华

苏长和 唐世平 肖 晔 于铁军

总 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象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的总结恰如其分:“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

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

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大战略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是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只有把握着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二

21 世纪初年,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 1978 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不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 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 19 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 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 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 21 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

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之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

有鉴于此,自2005年起,我们开始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

“大战略研究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大战略研究丛书”由两部分组成:西方学者的经典之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鉴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

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1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战略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日益凸显。10年来,我们先后出版了大战略理论、大国战略研究、中国战略研究等著述10种,始终处于大战略研究的前沿。10年来,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原创性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致力于推陈出新,呼唤学术精品。10年来,我们初衷未改,我们依旧抱持学术理想,我们同样强调学以致用,新的学术出版计划在酝酿之中。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门洪华



2015年1月5日

本书献给尼古拉斯和他们这一代人，
愿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战争

致 谢

大约在十年以前,受到正在出现的两种趋势的启发,我开始认真思考本书的中心主题。第一种趋势是当时国际体系中实力集中程度的降低。这一发展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单极世界能否和平地过渡到多极世界。第二种趋势是美国和欧洲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双方的不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表现得很明显,并在2003年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达到了顶峰。这种不和所引发的许多争执不禁让人们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20世纪的半个世纪中由大西洋民主国家打造的政治共同体可能会发生动摇,再一次成为地缘政治对抗的牺牲品。

在我的上两本著作中,我开始阐述国际政治中的这些变革。2001年,我的合作者和我出版了《转变中的权力:国际秩序的和平变革》(*Power in Transition: 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一书,明确地论述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全球权力的转换。十分感谢我的各位合作者: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让-马克·夸科(Jean-Marc Coicaud)、邝云峰(Yuen Foong Kong)。杰森·戴维森(Jason Davidson)和米拉·苏查拉夫(Mira Sucharov)贡献了其中一章,并且提供了其他有价值的研究帮助。联合国大学出版了这本书并提供了财政资助。我在《美国世纪的终结:美国对外政策和21世纪的地缘政治》(*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nopf, 2002)一书中聚焦于美国国际主义和跨大西洋关系的性质变化、美国首要地位的衰落和多极时代的发端。

这两本著作帮助奠定了本书的知识基础。国家应该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能够和平地应对变革、逃脱地缘政治对抗的宿命?围绕这一问题的探讨促使我思考一个既简单又深刻的问题——也是本书的中心命题:如何才能化敌为友?

我所属的两个机构——乔治城大学和对外关系理事会——为我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十分理想的环境。乔治城大学的同事和同学们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在其中我们可以尝试提出新的思想、考察历史上的案例。罗伯特·格鲁奇(Robert Gallucci)是外交事务学院的前任院长,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贯的鼓励和慷慨的支持。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同事们同样给我许多帮助和启发,提供了一个在政策圈内测试我的分析、结论的场所。我要感谢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先生,感谢他个人和理事会的支持,以及他为本书初稿所提供的富有洞见的评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十分幸运地成为几个学术机构的研究员。2007年到2008年间,我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担任研究员,在国会图书馆的克卢格中心担任亨利·基辛格讲席研究员(Henry A. Kissinger Chair)。我很感激这两个机构的支持和他们为我所提供的鼓舞人心、无可替代的学术研究环境。我要感谢威尔逊研究中心主任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和克卢格中心主任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以及这两个机构中的其他各位同事在学术上所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也要感谢欧盟委员会给予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慷慨资助,从而使我能够获得研究所需要的资金。

很多人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帮助,对此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我在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副手——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和乔舒亚·马库赛(Joshua Marcuse)——不仅在历史研究的案例上提供帮助,对于整个项目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智力支持。亚当·芒特(Adam Mount)是乔治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在研究接近尾声的时候加入进来,帮助我锤炼了本书的论点,澄清了这一论点对于更广泛的理论争论的意义。我还要感谢以下为研究提供帮助的人们:简·卡特赖特(Jan Cartwright)、卡拉勒格·霍夫尔森(Caralegh Holverson)、塞布丽娜·卡里姆(Sabrina Karim)、布莱恩·洛(Brian Lowe)、克里斯托弗·马克森(Christoph Markson)、乔纳森·蒙腾(Jonathan Monten)、帕克·尼科尔森(Parke Nicholson)、亚历山德罗·彼得森(Alexandros Petersen)、提姆·罗根(Tim Rogan)、康纳·萨瓦(Conor Savoy)以及布莱恩·蒂德(Brian Thiede)。

对外关系理事会召集的评阅会为本书初稿提供了反馈意见。感谢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主持会议。评阅会的参加者包括: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查尔斯·多兰(Charles Doran)、戴维·埃德爾斯坦(David Edelstein)、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Jackson)、查尔斯·金(Charles King)、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Legro)、罗伯特·利特瓦克(Robert Litwak)、凯思琳·麦克纳马拉(Kathleen McNamara)、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丹尼尔·内克松(Daniel Nexon)、艾维尔·罗什沃德(Aviel Roshwald)、斯蒂芬·萨博(Stephen Szabo)、塞缪尔·韦尔斯(Samuel Wells)、迈克尔·维尔茨(Michael Werz)以及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里卡德·本特松(Rikard Bengtsson)、史蒂文·库克(Steven Cook)、马格纳斯·埃里克森(Magnus Ericson)、阿里·卡科维奇(Arie Kacowicz)、拉纳·米特(Rana Mitter)、马格纳斯·耶内克(Magnus Jerneck)、彼得·特鲁波维兹(Peter Trubowitz)和汉斯-乌尔里希·约斯特(Hans-Ulrich Yost)对初稿进行了反馈。各位同事能够如此慷慨地发表这么多有益的评论,我感到十分幸运。

下列大学和研究机构传阅过本书的未完成版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米兰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Milan)、康奈尔大学、对外关系理事会(在华盛顿和旧金山)、哈佛大学、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国会图书馆克卢格研究中心、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东京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感谢相关讨论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所给予的评论。

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先生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愉快的。他与戴比·特加登(Debbie Tegarden)、凯伦·沃德(Karen Verde)以及他们的同事在指导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我也要感谢我的著作经纪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所提供的明智建议。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家人。南希·库普乾·索尼斯(Nancy Kupchan Sonis)、克利福德·库普乾(Clifford Kupchan)、桑迪·库普乾(Sandy Kupchan),以及尼古拉斯·库普乾(Nicholas Kupchan)带给我无

尽的爱、支持和鼓励。我的父亲莫里斯·库普乾(S. Morris Kupchan),给予我的实在太多太多,包括好奇心、守纪律、决断力等等——而这些对于做学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祖父理查德·索尼斯(H. Richard Sonis),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和彬彬有礼的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希玛·阿舍(Simma Asher)是我忠实的伙伴。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这清楚地表明她能够顽强地忍受我们这些作者在写作时必然伴随的特殊生活习性。她的爱、情和苹果酱蛋糕陪伴我度过难关。

查尔斯·库普乾

于华盛顿特区

目 录

第一章 持久和平	(1)
和平如何、为何发生	(5)
历史案例	(8)
从理论到政策	(12)
第二章 从国际无政府状态到国际社会	(15)
理论基础	(15)
关于持久和平的现有文献	(19)
重新审视现实主义	(24)
定 义	(27)
限定条件	(30)
持久和平是如何开始的	(32)
持久和平为什么发生	(48)
对持久和平光谱及其分解的理论化	(62)
第三章 英美和解	(67)
大不列颠与美利坚合众国(1895—1906)	(67)
第四章 和解：支持案例	(101)
挪威和瑞典之间的和解(1905—1935)	(102)
巴西和阿根廷的和解(1979—1998)	(110)
英日同盟的兴起和消亡(1902—1923)	(121)
中苏和解的兴起和消亡(1949—1960)	(141)
小 结	(161)

第五章 安全共同体	(163)
“欧洲协调”的演变(1815—1848)	(168)
欧洲共同体的演变(1949—1963)	(178)
1967年以来东盟的演变	(192)
“欧洲协调”的消亡(1848—1853)	(208)
1981年以来海湾合作理事会的演变和动摇	(224)
小 结	(245)
第六章 统一体	(251)
瑞士邦联的演变(1291—1848)	(253)
易洛魁族邦联(1450—1777)	(27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演变(1971年至今)	(285)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兴起和消亡(1958—1961)	(300)
塞内冈比亚邦联的兴起和消亡(1982—1989)	(311)
结 论	(324)
第七章 交友与择友	(346)
交 友	(347)
择 友	(360)
参考文献	(369)
译后记	(389)

图表目录

图

图 5.1 安全共同体：研究发现的总结 (248)

地图

地图 5.1 马来西亚 (195)

地图 5.2 海湾合作理事会 (227)

地图 6.1 瑞士邦联 (256)

地图 6.2 易洛魁族邦联(1750 年) (273)

地图 6.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87)

地图 6.4 塞内加尔和冈比亚 (313)

表

表 1.1 案例研究 (11)

表 2.1 国际政治、国际社会和国家政治的逻辑 (17)

表 2.2 持久和平的类型和界定特征 (29)

表 2.3 持久和平：出现的四个阶段 (33)

表 2.4 持久和平的路径顺序 (34)

表 2.5 持久和平的因果条件 (50)

表 4.1 和解：主要发现 (162)

表 6.1 统一体：总结相关发现 (345)

第一章

持久和平

在欧洲移民抵达北美很久以前,易洛魁族(Iroquois)人的部落定居于今天的纽约州北部地区。这些部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严重损耗了他们的人口。到了15世纪中叶,五个易洛魁部落痛感人口损失日益增多,于是聚集在奥内达加族人一个村庄的公共火堆旁,商议停止彼此间的争斗。他们建立的邦联(Confederation)不仅结束了战争,还带来了易洛魁族人超过三百年的和平。几个世纪之后,维也纳和会也构成了欧洲一个类似的转折点。1814年到1815年间,欧洲政治家们的这次聚会不仅标志着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的结束,也带来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该协定维持了大国间超过30年的和平。易洛魁族的代表们通过设立在奥内达加的大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解决争端,而欧洲外交官们更偏爱非正式的、视情况所需召开的会议来舒缓潜在的危机。但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持久和平。

尽管易洛魁族部落邦联和“欧洲协调”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它们都雄辩地证明了通过外交来克服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后者往往被视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必然特征。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十分欣赏外交的这一潜力;他从总统任期开始,就决定不仅要修复美国同其传统盟友的紧张关系,还要运用美国的影响力来处理一些世界上最为棘手的冲突。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总统声称,经历过内战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复兴的美国人“不得不相信:有一天历史的仇恨将会过去;部族的分界线很快将会消失;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的天性将会显现;美国应该在引领新时代的和平进程